

利玛窦的北京之行

岳宏

(天津博物馆,天津 300201)

[关键词]利玛窦,耶稣会,北京,万历皇帝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07-0069-04

近代欧洲最初对中国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耶稣会士的纷至沓来。利玛窦作为耶稣会在华传教事业奠基人(Mathew Ricci),通晓汉语、研读儒经、身着儒服,结交显宦,介绍西方科技,争取中国皇帝,引领了中西文化的首次大规模交流,取得了显著成就。其中,为争取皇帝支持的北京之行是这一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扩大了天主教在华的影响,为文化交流的深入开展创造了条件,还使利玛窦彪炳中国史册,甚至他在北京的墓碑也成了此后来华传教士的精神支柱。本文以利玛窦进入北京的历程为线索探讨他如何走向成功之路。

进入北京的渴望

进入北京是利玛窦最主要的愿望,这是几代传教士的共同愿望在利玛窦身上的延续。他们曾设想,在大一统的中国,如果皇帝皈依了天主教,那么,整个国家就会成为他们的乐土。从沙勿略(Francis Xavier)、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到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莫不如此。

然而,在当时别说前往北京,就是进入中国都异常艰难。据不完全统计,从1552年至1583年,计划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有50人,尝试的次数达59次,结果,只有25人进入中国,并在短暂停留后离去^[1]。

利玛窦之前的传教士们都未能进入京城,这一任务历史性地落到了利玛窦的肩上。他将进入北京看做是自己最大的努力目标^{[2] (p.23)}。他曾对友人说:“假使我们不能到皇宫里对着皇上宣讲福音,设法求得他的许可,至少允

许我们在中国境内自由传教,那末,将来传教要得到保障,也就什么也不能成就。”^[3]为此,他不主张立即大量发展教徒,认为只有皇帝允许,中国人才会大批皈依基督教。他曾幻想,只要能到达北京,争取皇帝的允许也许会很容易。

此外,进入北京也是基于改善耶稣会士在华生存的现实需要。由于天主教与中国儒家文化在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在宗教方面,存在中国的天命观与西方上帝的冲突;在伦理道德方面,存在尊祖敬宗与独尊上帝的冲突;在政治方面,存在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的纲常观念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教之间的对立等^[4]。因此,在华期间,尤其是进入北京之前,利玛窦等人经常受到基层官吏与民众的敌视,并引发了一系列冲突。1583年,刚到肇庆的利玛窦就遭受了袭击教会的困扰。1592年,被迫迁居韶州(今韶关)的利玛窦曾表露:“没有一年我讲不出一件事端,甚至重大危险,往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5] (p.157)}据统计,明代共发生教案54起^[6]。除教案外,由于地方官的排斥,利玛窦几乎被遣回澳门,最后不得不迁徙韶州。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为了确保在华传教事业的成功,利玛窦决心寻找一切机会去北京谋求皇帝对传教的认可。他发誓说:“我们非至直诣皇帝之时不会有新的扩展,否则,会遭受中国人的猜疑,给人以机会在我们获得稳定留居的官方保证前就把我们赶出中国去。”^{[5] (p.230)}

漫长的进京之路

利玛窦有能力为进入北京创造条件:他结识了众多官僚、士大夫,仅文献可靠者记载就达137人,其中,1601

【收稿日期】2008-01-11

年进入北京之前结识的为 83 人。在这些入中有王公贵族、中央及地方官员，如建安王、乐安王、魏国公、南礼部尚书、南刑部尚书、南户部尚书、兵部侍郎、两广总督、江西巡抚、应天巡抚等，他们曾多次设法帮助利玛窦前往北京。

早在肇庆时，知府郑一麟就曾“有意要一位神父陪他去北京”，只是由于手下人的反对才作罢^{[12] (p.191)}。在韶州时，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得知利玛窦精通数学后，表示“将把利玛窦带到京城去校正中国历法中的错误”^{[12] (p.272)}。1595 年 5 月，兵部侍郎石星将利玛窦带出韶州，并曾打算带往北京，由于害怕“在战争恐慌时期把一个外国人带进京城而受人指摘”才打消了此念头^{[12] (pp.277-278)}。同年，利玛窦到达南昌。正是在这里，利玛窦接到耶稣会远东教务总视察员范礼安的指令：“尽一切努力在北京开辟一个居留点。”如果说，在此之前利玛窦对进京之事还只是被动地听从官员们的安排，那么，此后利玛窦就开始“千方百计想尽办法，计划着进入北京皇城”^{[12] (p.315)}。他曾试图通过在南昌的建安王进入北京，因为在血统上他与皇帝最接近。他给建安王看了准备献给皇帝的礼品。稍后，经过审慎的思考他又放弃了这一计划。后来他遇见了经南昌前往北京的王忠铭，并使王同意将其带入北京。1598 年 6 月 25 日利玛窦乘船离开南昌，前往北京。

由于时值朝鲜战争，进京沿途戒备森严。在南京，利玛窦几乎被高度警惕的士兵逮捕。在天津，利玛窦发现“整个河上布满了战舰，满载军队”^{[12] (p.327)}，这里已成为战争的后方基地。

9 月 8 日，利玛窦进入了朝思暮想的北京城，“这真是一桩令人欣喜的事，我们不应缄默着把它放过去；只要想想基督信仰跨过多少海洋，经过这样长时期的接近之后，终于进入这个国度，它的使者终于进入了皇都”^{[12] (p.328)}。

然而，令利玛窦感到意外的是，此时的北京却丝毫不欢迎他的到来。先是王忠铭联系的太监拒绝帮助利玛窦进入皇宫，而后王忠铭本人“也开始认识到，自己卷入外国人的事是很危险的，而且对自己的努力感到绝望”^{[12] (p.334)}，于是，他打算把利玛窦等人送回南京。在此不利的形势下，利玛窦等人仍设法留在北京。他们“用各种方法进行他们的事业，但全归无用。不管是利玛窦神父的友人或是尚书王忠铭的友人，没有一个愿意甚至只在家中接待他们一次单纯的访问”^{[12] (p.335)}。四处碰壁后，利玛窦唯一的选择就是回南京。利玛窦的首次北京之行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此后，利玛窦仍继续努力。首先，他广泛传扬将向皇

帝呈献礼品的消息，以打动皇帝的好奇心，从而再次进京。其次，考虑利用宦官的渠道进京。他曾通过留在南昌的神父结识的太监来筹划向皇帝献礼之事，后终因不信任宦官而未成。最后，进一步动员他的中国朋友为进京提供帮助。他将“一部分新奇的礼品分送几位大臣，希望以此换得信件和推荐信”^{[12] (p.332)}，还在几位士大夫的帮助下找到“皇帝的顾问祝石林”^{[12] (p.332)}，祝承诺负责办理相关的公文。祝石林“还向北京的一位身居要职的大臣发出了推荐信”^{[12] (p.333)}。

一切准备就绪后，踌躇满志的利玛窦于 1600 年 5 月 18 日从南京起航，经运河开始了第二次北京之行。

原本一路顺风的利玛窦在山东临清遭到了天津税监宦官马堂的阻拦。为了消除这一障碍，利玛窦找到了身为地方官的朋友，然而得到的不是帮助，而是告诫：“要想找个人能阻止他（马堂）是徒劳的，而且这样做会带来很大的危险。”^{[12] (pp.389-390)}利玛窦还试图用“在北京有几位高官已答应照料他们（利玛窦一行）的事情”来冲破阻拦，得到的回答却是“没有一个高官对皇帝能像他（马堂）那样有影响”^{[12] (p.391)}。利玛窦随后被遣往天津，在那里滞留半年。在此期间，利玛窦虽曾派人携书进京寻求帮助，但却一无所获。利玛窦担心他们“迄今的成就可能毁于一旦”^{[12] (p.397)}。

马堂的出现和其后的作用引出了明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宦官把持朝政。这一问题直接影响到利玛窦的进京行程。

宦官——进京的唯一途径

在中国历史上，明朝是宦官专权最严重的朝代之一。利玛窦居华时期的万历皇帝在长达 30 年的“怠政”时期，因与大臣隔绝而更加依赖宦官，使宦官的权力和影响越来越大，几乎垄断了宫廷的一切事务。在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中，比较著名的宦官有 15 人，而万历一朝（48 年）就占了 7 名。

由于万历皇帝的极度挥霍，大搞土木工程及连年用兵等，使得国库亏空，入不敷出，从 1596 年开始向全国各地派出宦官，作为矿监税使，聚敛财富。据不完全统计，从万历二十五年（1597）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 年）的十年

根据林金水《利玛窦交游人物表》统计，转自《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根据王春瑜、杜婉言《明朝宦官》，紫禁城出版社，1989 统计。

间,这些宦官每年向宫廷进奉的白银约171万两^{[7] (p.764)},超过了原收入的30%,因此,他们深受皇帝的信任 and 庇护,直接干预利玛窦进京的天津税监马堂在其中就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此,有必要介绍一下其出现的历史背景。

与北京近在咫尺的天津在明代虽然只是一个军事基地,但作为大运河的北方枢纽,随着漕运的发达,贸易的兴盛,到明代中叶以后,逐渐成为北方的商品集散中心。南来北往的商人纷纷涌入天津,带来了各地的商品,主要有来自广东、福建的蔗糖、茶叶、纸张、海产品、木料、干鲜果品;江苏、浙江的丝绸、布匹;江西的瓷器;河南的粮食;辽东的豆类;河北的陶器以及北方各地的棉花等。这些商品在天津交易后输往各地。商业的发达使天津早在1493年就形成了十集一市。此外,天津的制盐业也比较发达,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天津就有“万灶沿河而居”的记载,当时天津盐的年产量约1500万公斤,占全国总产量的10%左右^{[8] (pp.143-157)}。繁荣的天津经济为明朝政府提供了丰厚的赋税。万历年间,政府增加了十余种税,其中“天津店租”位居增税之首^{[9] (p.36)}。1597年,御马监太监王朝首先被派到天津征收商税,次年,王朝死于任内,同为御马监太监的马堂接任,并兼任临清税监。从1598至1599年、1601至1604年及1606年的七年间,马堂为皇室提供了287391两白银,平均每年41000两^{[7] (pp.759-762)},因而深受万历皇帝的庇护和支持,对有碍于马堂的人,万历皇帝无不予以惩处;对于各地官吏弹劾及要求惩处马堂的上疏,万历皇帝不是置之不理就是不予采纳。

尽管宦官实际上已成为利玛窦进京时必须依赖的势力,然而,他对宦官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成功经历的曲折性。他的《中国札记》中充满了对宦官的谴责和蔑视。这首先是由于穷奢极欲的宦官在各地的横征暴敛中形成的种种劣迹使利玛窦产生了反感。其次,是受到了宦官的对立面——官僚集团和士大夫阶层的影响。最后,作为“西儒”的利玛窦对于宦官的出身和素质有一种天然的蔑视。这些都使得利玛窦极不愿意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求助于宦官。不仅如此,这一态度还使利玛窦在其著述中某种程度地抹杀了马堂对其成功的帮助,而宁愿归于上帝的护佑,并对马堂的行为产生了误解。

马堂的帮助——进京的关键

马堂的恶名并不妨碍他帮助利玛窦于1601年1月离开天津,抵达北京。马堂的动机很简单,就是为了邀功

请赏,这既可以使他在宦官集团中独占鳌头,又可以借此打击对立的官僚集团。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堂必须首先帮助利玛窦达到目的。

马堂的帮助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为利玛窦进京向皇帝上报奏章。7月3日,利玛窦到达临清,7月15日前后,马堂为利玛窦进京上报了奏章,并“盛装亲送将去北京呈交奏章入大内的仆人至大门以外,同时鸣炮一响告知全城这一重大事件”^{[10] (p.315)}。第二,将利玛窦从远离京城的临清送往首都门户的天津。当时的形势是,朝鲜战争刚刚结束,礼部官员们之间弥漫着排外情结。有鉴于此,加之以往的惯例,马堂完全可以把利玛窦送回南京,甚至南昌,而将“方物”代为进献。然而,马堂却选择了将利玛窦由临清送往天津。第三,利玛窦进入北京后,马堂的人向他提供了“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并陪伴其生活^{[2] (pp.404-407)}。在袖手旁观的官员面前马堂提供的这种帮助显得尤为难得。利玛窦失望地发现:“在所有那些从南京有信带给他们的人当中,几乎没有一个是能给予任何帮助的。实际上,他们大多数人都不愿与神父打交道,唯恐由于里通外国而失宠。”^{[12] (p.409)}面对此情此景,对马堂素无好感的利玛窦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不是与马堂相遇,“他们就会像一个毫无结果的使团那样从北京返回,正如他们第一次的情况”^{[12] (p.410)}。第四,当利玛窦在北京被礼部官员囚禁时,马堂的人试图进行解救,只是在遭到神父和礼部官员的拒绝后才作罢。第五,马堂的太监集团将利玛窦遭礼部官员拘留一事上报皇帝,皇帝对此“极不高兴”,并将礼部打算把神父们送回广东,甚至遣返回国的奏章“搁在一边,这就等于是否定它”^{[12] (p.419)}。此后,礼部要求遣返利玛窦的一系列奏章均未得到皇帝的批准。相反,利玛窦从太监那里得到了皇帝的口头决定:神父们“可以放心住在京城里,他(皇帝)不愿再听有关让他们回到南方或本国的话”^{[12] (p.422)}。马堂对利玛窦成功进入并留居北京所给予的帮助是毋庸置疑的。出于对宦官的憎恨和蔑视,利玛窦习惯于将其归为上帝的护佑。

除了不愿正视太监的帮助外,利玛窦在与马堂的交往中还表现出了某些误解,甚至偏见,试举几例:利玛窦将马堂帮助其进京的各种许诺看作是为了在“人们面前掩饰他的欺诈”。事实证明,马堂并未食言。利玛窦将天津之行视为入狱。事实是,在天津期间,利玛窦先是住在船上,随着冬季的临近,为了避寒,马堂让利玛窦等人“带着他们的全部行李搬进一座偶像的庙宇,并派了四名士兵看守他们”^{[12] (p.394)}。这或许有某种监视意图,但考虑到当时

天津是一座重要的军事基地,这是可以理解的,况且这些士兵又不管他们“做些什么,或到哪里去”^{[12] (p.397)},利玛窦甚至可以派人前往临清、北京送信,而没有受到任何检查。由此看来,四名士兵的“看守”不能作为“入狱”的标志。对于马堂反复检查礼品,并将其运往自己家中的行为,利玛窦认为马堂企图据为己有,只是在皇帝下旨后才将礼品归还。尽管马堂为人贪婪,但他是否有胆量侵吞早已上报皇帝的礼品是值得怀疑的。马堂用于邀功请赏的主要是利玛窦携带的礼品,因此马堂对这些礼品倍加重视,反复检查,唯恐出错,并将它们运到家中妥善保管。

利玛窦成功的关键:进入北京,并不是由他倾力结交的官僚士大夫促成的,而是由他一贯憎恨的宦官马堂使然,这构成了利玛窦在华经历的一个悖论,同时也使这种经历更富有色彩。

利玛窦进入北京得到皇帝的眷顾,加之结识的中央官吏扩大了他的声望,从而使中国教徒迅速增加。经过14年漫长的历程,1596年只发展教徒100余人,进京两年后的1603年就增加到约500人,1605年达到1000余人,1610年更达到约2500人^{[7] (p.1102)}。利玛窦的声望还有助于消弭教案,改善传教士在内地的生存状况。此外,稳定的京城生活使利玛窦加大了对于西方文化的译介,在

京期间与徐光启翻译了著名的《几何原本》。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利玛窦的北京之行在中西关系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简介】岳宏,男,1962年生,江苏镇江人,天津博物馆历史研究部副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豆艳荣】

参考文献:

- [1] Charles E. Ronned, East Meets West: the Jesuit in China 1582—1773[M]. Chicago 1988.
- [2]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3] 陈申如,朱正谊.试论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历史作用[J].中国史研究,1980(2).
- [4] 宝成关.中西文化的第一次激烈冲突——明季“南京教案”文化背景剖析[J].史学集刊,1993(4).
- [5] [法]裴化行.利玛窦评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 [6] 黄启臣.明代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文化效应[J].史学集刊,1994(2).
- [7] 南炳文,汤纲.明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 [8] 张利民.解读天津六百年[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 [9]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简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

您教学效益的提高,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教好历史课,借助好的多媒体课件很有帮助。

现在,依照新课标和教科书的要求,每一节课所需要的基础材料——发生在历史中的故事、凝固在历史中的画面、回响历史的声音、再现历史过程的动态地图……我们借助多媒体技术优势,将它们组织在开放式PPT演示工具里,您可自由进行增加、修改,操作十分方便。

接下来,就是用您独特的教学思想,将它们统领起来,自由发挥了。

如果您还有好的教学创意要实现,我们将免费提供进一步的个性化服务,请登录:www.yiduiyi.com。

“博今”历史教学软件(初中版)10张光盘,包含7—9年级内容,360元/套。

“博今”历史教学软件(高中必修)3张光盘,包含必修1—3教学内容,240元/套。

“博今”历史教学软件(高中选修)6张光盘,包含必修1—6教学内容,360元/套。



邮局汇款: 银行电汇:
北京邮政96局053信箱 邮编:100096 开户行:工行北京清河镇支行
联系人:刘晖 户名:北京一对一教育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81730339 账号:0200006109200027369

注:可电话订购,先邮寄,后付款。请在汇款留言中注明软件名称和数量。